

文章编号: 1000-8934(2016)09-0124-05

DOI: 10.19484/j.cnki.1000-8934.2016.09.022

论自然史和人类史相互制约的生态危机旨向

余玉湖^{1 2}

(1. 重庆工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0067; 2. 四川大学 经济学院 成都 610065)

摘要: 自然史与人类史相互制约。在不同时期,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活动作用下呈现出人与自然的的不同关系:在采集天然物的“蒙昧时代”,人与自然关系表现为“依附—臣服”;在自然物增殖的“野蛮时代”,人与自然关系实现向自然物增殖的转变;在自然物加工的“文明时代”,自然成为人类奴役的对象;在自然物控制的“垄断时代”,“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的生产方式不但直接制约着自然史的发展,也对人类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变革“旧”的生产方式,使之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对于当下人类化解生态危机,探索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时代”具有重要的理论旨向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自然史; 人类史; 生态危机; 物质变换; 相互制约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地球的演化逐步分化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又在逐步演化中使自然界与人类世界融合,人类社会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生产劳动,表现出了双重关系: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相应形成自然史与人类史。马克思认为“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¹⁾⁶⁶

一、自然史与人类史 演化与融合的发展阶段

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历史来考察,自然史是人类史的基础和前提,自然界的长期发展和演化过程中逐步孕育着人类史的产生。人类史形成以后,自然的发展史就融合了人类发展的历史。“人的身体,尤其是我的身体,乃是世界的一部分,是世界的其他部分,动物、植物、石头,等等中间的一个部分。”⁽²⁾¹⁶⁸但自从人类诞生后,人类借助工具—技术系统的进步,通过发明和发展多种工具和手段,能够开发其他物种不适合生存的栖息地,也找到其他物种维持生命找不到的资源,包括人造物质和材

料,逐步从自然界分化出来,逐步形成人类史,创造人类生存的人化环境。人类借助工具—技术系统,使他们最终能克服自然演化的自然限制,跨过他们的增长极限,但自然也以物质变换方式制约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

人类早期从自然界中采集食物和猎取动物相结合的方法获取生存资料,这被认为是“人类采取的最为成功、最具灵活性,也是对自然生态系统损害最小的生存方式。这使得他们能够扩散开来,穿越地球的表面,进入到每一种陆地生态系统之中,不仅在容易获得食物的有利地区能够生存,而且在北极、冰期欧洲的苔原和澳大利亚及南非这样干燥地区的严酷条件中也可以生存。”⁽³⁾²¹这种生存方式使人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活动,也形成相应的自然史与人类史融合的阶段:采集天然物的蒙昧时代、自然物增殖的“野蛮时代”、自然物加工的“文明时代”、自然物控制的“垄断时代”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时代”。

1. 采集天然物的蒙昧时代

人类成文史前的原始社会时期,经历着生命史上最漫长和曲折痛苦的艰难创业的历程。砾石

收稿日期: 2016-05-1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生态危机批判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5XKS001),重庆工商大学教改重点项目“新常态下高校思政课由专题教学向责任主体教学模式转变的改革研究”(2015102),重庆工商大学研究生教改项目“新常态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课进行‘四个全面’教育教学研究”(2015YJG0208)。

作者简介: 余玉湖(1977—),江西广丰人,哲学博士,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在站博士后,重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研究、生态哲学、经济学。

工具的制造使用说明当时存在着称得起是人的第一批动物;火的使用和弓箭的制造是早期人类最惊人的发明。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对于使用简陋工具从事采集狩猎生产而刚刚脱离动物界的早期人类而言,绝大多数群体只能依靠着很少的物质以生存下来,因为他们可以得到的食物总量很少,人对自然界低水平的作用能力必然承受着强大的外部自然力的高度制约。人类早期与自然的原始和谐与统一的本质是人对自然的依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呈现出“依附—臣服”的特点。

人类形成以血亲为纽带的协作集体,实现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原始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以人对自然的臣服为代价,自然产物的有限性限制着人口的数量。个体和群体的生存依赖于自然的产出。臣服于自然的人类为了生存,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以控制人口数量,保持较小规模的群体,以便不过分地榨取所处生态系统的各种资源,来减轻对生态系统的压力。通过一些为当时部落公众所普遍接受的社会习俗,如杀婴、弃婴、丢弃病弱的老人等途径,减少人们对食物的需求以保持人口与食物来源之间脆弱的平衡。这种文明时代被视为极其野蛮的手段当时却是符合道德的,因为,通过限制人口数量来限制食物需求总量是人们在特定区域持续生存的必要前提。

2. 自然物增殖的“野蛮时代”

随着人类步入文明史,人类的主体能动性转化为作用自然的现实力量逐步增强,禽畜养殖、农田开发与农作物栽培促进了农业、畜牧业的形成与发展,人们通过家畜的饲养、作物的栽培和陶器的制作,有意识地创造新的物品,农业文明悄然而至。作为更多努力的回报,农业文明在发展中实现了自然物的增殖,可以在一个较小的土地面积上提供更多的食物,标志着人类由被动适应环境,顺从自然向自主适应环境、实现自然物增殖的转变,初步改变了人对自然的依附地位。

3. 自然物加工的“文明时代”

从蒸汽机的发明,内燃机技术运用,到电子技术的广泛使用,奠定了近代工业文明的技术基础,使得大规模的生产不仅可能而且必要,工业化的大生产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生产和制造了大量的产品,关键是加工和合成了人工产品,极大提高了环境和资源的人口承载能力。工业文明的到来是与资本主义的崛起分不开的,资本对利润的追逐成为推动工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贸易和各国的交往,

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欧洲和北美的发达国家在几次工业革命进程中加大了资源开发利用的强度,他们采取了经济和非经济的手段肆无忌惮地占有全球性资源、利用全球性环境容量,以超强的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率先进入近代工业文明时代,也为日后形成严重的生态危机埋下了重要的隐患。

4. 自然物控制的“垄断时代”

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后工业革命时期,前期通过对本国的资源和殖民地国家资源掠夺方式取得了GDP的快速增长,使其在全球化过程中确立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垄断”地位,通过制定政治、经济和贸易等游戏规则,建立了所谓的“国际秩序”,进一步掌控全球资源,并通过输出其文化价值观,推行民主模式,建立所谓的“普世价值”维护其既得利益,这些特征表明自然物控制“垄断时代”的到来。这一时期表现为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寡头的出现,他们通过制定国际贸易规则,控制全球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贸易,他们操纵虚拟货币,利用货币的汇率差坐食全球资源,跨国公司是其垄断资源的组织机构和载体,政治集团和军事组织听命于金融寡头,为他们的全球利益服务。当全球性资源被一部分人所“强制和垄断”,也就意味着其他民族、国家和阶级发展的自然资源基础遭受侵蚀。

二、自然史与人类史相互制约对生态危机的影响

对既往自然史与人类史演化和发展的反思与批判中,在自然物加工的“文明时代”之前,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中,人类作用自然的力量有限,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有限。自然物加工的“文明时代”到来,工具—技术系统的进步提供了人类有效突破自然束缚的现实手段,以借助外部自然的力量实现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升级。自然物控制的“垄断时代”开启了全面开发、利用各类自然资源的新时代,人与自然关系呈现“征服—控制—惩罚”的特点。“如果全球达成一项国家干预市场、便于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协议,这就意味着导致全球的自然资源有可能被垄断和控制。”^{(4) 981}当少数人仍然占有大多数人的资源和利益的时代,人与自然的的关系就无法理顺,在自然物控制的“垄断时代”,对自然

物的加工和改造必然造成资源开发利用的破坏性,对资源开发占有的不平衡性以及资本利益集团掠夺资源的必然性和全球性,这不但违背了社会公正性,而且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是形成当代生态危机的最重要原因。

1. 工业化、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人与自然交往的普遍性,也扩展了生态危机产生的范围和领域。

工业化大生产的发展需要开拓世界市场,使全球范围内的普遍交往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要。在大工业条件下形成的世界历史性存在奠定在全球性的自然条件基础上,全球性分工条件下的生产与世界性消费必然使大工业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和所影响的外部环境愈来愈具有全球性的性质,不同群体与自然的交往关系愈来愈突破局部地域的局限,而且愈来愈受到他人与自然交往的影响,全局上看,人类全体与地球自然愈来愈具有普遍性的交往不断地突破已有的活动领域。这种人与自然交往的普遍性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表现为人对人的剥削性以及人对自然剥削的相关性,当一部分人“垄断和强制”了一个社会的发展,而另一部分人为了生存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人们为生存,会不惜牺牲自然,对自然进行剥削。这样,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不可能是合理的,而当人与自然的关系尚不具备“合理性”的时候,自发的文明带给人类的只能是荒漠。

2. “征服—控制”自然造成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必然导致自然的“惩罚—报复”,也导致了生态危机发生作用的必然后果。

人类在“理性万能”的作用下,对自然进行掠夺式的征服、疯狂式的开发和破坏,产生了严峻的生态危机,为此,人类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已经知道(我希望我们已经知道),征服者最终都将祸及自身”⁽⁵⁾ 194-195。在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要认识到它不仅加剧了阶级的矛盾,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加深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与对抗,而且造成了不同民族与国家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矛盾与差距。

“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⁶⁾ 385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驱动,但这种驱动是建立在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以掠夺和消耗大量自然资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为代价的,而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了发展时间差,在全球范围肆无忌惮地掠夺资源的基础上率先进入现代工业文明,造成全球资源短缺,削弱和阻碍了其他后发民族和

国家发展的基础,并且转移和转嫁生态环境污染,“贫穷国家以接收电子垃圾和工业污染物为代价,换取发达国家的资助资金来保护森林,减少碳排放。”⁽⁷⁾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长远来看,这种竭泽而渔的社会实践对全球,无论是发达国家的发展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都是影响很大的。

3. 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对资源的垄断性和掠夺资源的必然性,也奠定了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性和必然性。

在资本逻辑支配下,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以“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⁶⁾ 385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会加速资源的消耗与枯竭,导致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以追逐利润为目的,追求剩余价值为目标,自然成为其掠夺的出发点,而不是其归宿。资本家只关心他的利润和利益,不会顾及后续或长远的利益,这种短视行为也直接影响着他们对自然物的态度。

人类作为地球生物进化过程中质变的产物,不仅共同拥有土地与资源,而且共同依赖于土地与资源,资本对利润的追逐连他人的健康与生命都可以牺牲,掠夺性开发、滥用人类共有资源等恶劣行径的存在更是不言而喻的。早期的资本主义掠夺自然的方式是“以掠夺高密度的矿物和生态物质获取高额利润”⁽⁸⁾,马克思恩格斯曾在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土地资源时指出,土地资源是人类共有的,不仅是这代人的,也是下一代人的,任何时代的任何人都不是土地所有者,而只是拥有土地使用权,如果一个社会制度任由私人占有土地及其相关自然资源,必然导致社会资源的公平正义问题。

马克思指出,土地等自然资源应该归社会成员共有,每个人只有对土地的使用权,是利用者而不是占有者,如果个别人可以占有土地等自然资源就如同他可以占有你的人身的私有权一样荒谬,“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⁹⁾ 878

马克思恩格斯洞察到人类社会在资源环境开发利用方面出现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问题,批判了掠夺性滥用土地资源的生产方式,揭示了土地资源所反映出的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过程中人类共性的矛盾问题,提出了人类对于资源持续利用的历史责任,上述前瞻性思想无疑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即使在21世纪的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前瞻的价值引领意义。

三、化解生态危机的现实旨向

生态危机表征着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程度,人类化解生态危机实质是处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如何实现这种人与自然的“合理性”?弗洛姆认为“人的终极目标是达成与自然的新和谐”^{(10) 184-185},在他看来,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人又能超越自然,人最终能同自然界达到新的和谐。马克思提出要在实现“人类本身的和解”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只有当“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9) 928},人与自然的和解才具有转变为现实的可能性。为此,必须打碎旧的社会体制,实现社会变革,建立能适应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新的社会制度和体制,通过彻底的社会变革,实现人与人的和解,为人与自然的和解创造必要的社会前提与基础。“人类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人改变自然的同时也改变自己——是它自然的本质。”^{(11) XI}自然史必然要走向人类史,由此化解生态危机也必然从面对自然走向人类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背后实质上体现的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只能由全面发展的自由人来创造,并描述了自由人首先是摆脱强制分工制约下的奴役劳动,必须以人类实践水平的提高为前提和基础。认识水平的提高是人们能够透过现象深入本质,以认识自然的规律为我所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缩短了满足人们生存与发展的物质资料生产的时间,使得人们获得充裕的闲暇时间,实现个性基础上的全面发展。

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生产力水平的目的却是为了满足企业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当资本对利润的追逐与环境保护发生矛盾的时候,置于优先地位加以考虑的往往是利润。他们所遵循的“重要原则就是服务于经济发展的资源和环境都必须有一定的价格。视它们为零价值的东西就极有导致资源过度利用的危险。”^{(12) 5-6}19世纪,恩格斯曾经尖锐地批判了西班牙种植场主糟践自然的粗暴行为,为了获得咖啡树肥料的高额利润,不惜烧毁大片的森林以获取木炭,以至于这一带肥沃的土壤被冲走,变成不毛之地,影响整个区域的生态环境。这种谋取眼前利益的短视行为在私有制社会

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6) 385}同样,出现“在新月和地中海东部地区,森林砍伐导致了农业的衰落和相应的毁灭性的社会政治后果,不幸地导致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脆弱。他们是破坏自己的资源基地,是生态自杀行为”^{(13) 411}。这类现象揭示了“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6) 385}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本质上对自然极具危害并招致自然的报复和惩罚。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恩格斯的上述论述并没有过时。20世纪中叶以来,愈演愈烈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并没有阻止谋取利润的冒险,50年代末,美国为了垄断资本家的利益,拒绝参加保护环境工业会议,不愿意为环境保护支付经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性废弃物船运出口事件有禁无止,愈演愈烈,发达国家的工业、生活垃圾大量转移,后果堪忧。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对环保的思潮不是出现在发展中国家,而是在发达国家,他们认为地球的生态环境是好的,可以通过科学技术解决一切生态环境问题,认为生态环境问题是环境保护主义者臆造出来的产物,因此,政府的环境保护投入是一种可耻的浪费。针对政府的环境保护措施,他们提出,“如果我们能就此醒悟并且使政府不去干预公司的话,情形就会变得更好,认为投资环境的利润和效益不高,规模巨大,且区域分割,各自为政,很难取得想要的效果。”⁽¹⁴⁾以上事实说明以追求利润、实现增殖的资本在本质上与环境保护是对立的。

事实上,某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举起环境保护大旗的前美国总统戈尔,以造成肥沃表土层损失的美国农场水土流失为例,分析为什么没有“在小小水沟生成之前加以阻止”的原因,指出“部分答案在于:租用土地以求短期赢利的人们往往不在乎土地的未来”^{(15) 15}。他们也提出采用国家调节方法作为形成“社会—自然”关系的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补充,加强国家对自然资源利用的干预,加强管理,以达到促进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目的。但是,在一个充满利益冲突的社会里,剥夺者不仅剥夺他人,而且剥夺自然,满足公共利益、保护公共草地的整体和全球要求的环境政策究竟能够存在吗?保护古老的农村公共用地只需不同利益方之间的相互协调,而保护全球公共用地——世界海洋和大气空间依赖超越所有权利方之上的强有力机构。从迄今为止的历史经验中,人们很难想象此类有贯彻力度的机构存在。

当国家对主导经济的干预手段越来越不得力时,对在环境政策中采取与市场协调的措施的呼声亦越来越高。事实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工业资本家从未主动采取减少烟雾的预防措施,虽然他们能够处理改善燃料的利用状况,采用“管道终端预防措施”,但这种措施仅仅转移了有害物质,使之离开人们的视线,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当今,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似乎还需假以时日,市场经济以其调节商品生产、流通、消费的高效率在经济领域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主导作用。人类化解生态危机实质是处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以实现生态系统和谐发展,如同“一位医生在给病人治病时,不仅仅只是从局部器官去治愈,而要从一个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出发,考虑各元素对环境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¹⁴⁾我们应该充分挖掘自然史与人类史相互制约蕴含的生态思想,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解、人与社会和谐生态图景提供一种合理的路径,“一个我们借此可以弄清问题和保证给予解决的合理路径”^{(16) 15},也为化解“生态危机”,探索生态文明建设,建立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时代”提供理论和现实旨向。

(本文得到了陈墀成老师的指导,并吸收了他的思想和观点,特此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卷[M].涂纪亮,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 (3) [英]E·库拉.环境经济学思想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4) I. Nessel. (eds.) The Palgrave Encyclopedia of Imperialism and Anti-Imperialism[M]. Immanuel Ness and Zak Cope Press,2016.
- (5) [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7) Hobbs, B. K. Protectionism and property rights: Coasian bargaining and debt - for - nature swaps [J]. Economic Affairs, 2012, 32(6): 68 - 73.
- (8) B. Clark and J. Bellamy - Foster. Ecological imperialism and the global metabolic rift: unequal exchange and the guano/nitrates trad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2009, 50(3 - 4): 311 - 334.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10) [美]埃里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M].张燕,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 (11) Howard L. Parsons. Marx and Engels Theory Of Ecology: Contributions in Philosophy [M]. London: Greenwood Press,1977.
- (12) David W. Pearce, Anil Markandya, and Edward B. Barbier. Blueprint for A Green Economy [M]. London: Earthscan Press,1989.
- (13) Diamond J.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M]. New York: Norton Press,1999.
- (14) A. S. Kerzhentsev. Conflict - Free Transition of the Biosphere to the Noosphere: A Reasonable Way Out of the Ecological Crisis [J]. Herald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2008, 78(3): 286 - 292.
- (15) [美]阿尔·戈尔.濒临失衡的地球——生态与人类精神[M].陈嘉映,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 (16) Reiner, Grundmann. Marxism and Ecology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1.

On Orientation of Ecological Crisis Concerning Interaction Between Nature History and Human History

YU Yu - hu^{1,2}

- (1.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2. School of Economic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Abstract: It interacts between nature history and human history. In different times, material exchange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shows diff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displays attachment—obedience in stage of savage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realizes proliferative transformation in the stage of barbarism; nature becomes enslaved objects of human in stage of civilization of processed natural materials; mode of production of gaining - profits - becoming - only - impetus not only restricts directly the development of nature history but also influences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in stage of monopoly which is the important root of causing ecological crisis. Hence it transforms outdated mode of production and adapts objective deman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Eventually it is significant for resolving ecological crisis, probing into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realizing the stage of ecology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And it is significant for important theoretical aim and practice.

Key words: nature history; human history; ecological crisis; material exchange; interaction

(本文责任编辑:董春雨)